

# 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

沈晓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一直立足中国实际，以实践为基础，活态流变且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继承与弘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与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被拉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到“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戊戌变法，再到“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由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际需要，在当时情势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主流是“否定传统、肯定西来”。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客观分析的冷静态度。李大钊同志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极对峙的语境之中就保持了比较理性的态度：“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輊于其间。”他认为，新旧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客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固守的坚操”。中国青年学者应“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以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在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李大钊认为“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无疑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新文化的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扬弃与利用

这一时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李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蕴含着中国人民丰富的生存智慧、道德规范和审美旨趣，是乡村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力量，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安徽既是农业大省也是文化大省，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乡村道德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

现代生活方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与乡村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工业文明深刻影响着村民原有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人们更加注重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效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和价值逐渐淡化，广大农村地区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节日、活动等影响力减弱。此外，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使村民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和兴趣下降，年轻一代往往更崇尚城市生活，一些传统的民俗文化由于脱离了现代生活并不受他们的喜爱。

优秀传统文化供给与实际需求有差距。一是乡村地区文化建设存在同质化现象。在一些地方“送戏下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往往将多元的传统文化纳入到统一设计的政策调配中，对不同农村地区基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一是营造和培育传承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乡村社会文化氛围。借助新型载体、网络媒介对乡村戏曲、民俗、歌谣等传统表现形式进行大胆创新，打造具有教育性和时代性

的方。中国共产党人贯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原则，中共八大决议强调：“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有计划地开始整理古籍，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1960年毛泽东同志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专门谈到“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并说，“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承与弘扬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明确强调不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概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强调“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进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

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胡锦涛同志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文件，比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文化教研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论述中总书记十分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家庭美德的作用，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指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千古名臣包拯是培育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传承优良家风的杰出典范，他所构建的“孝肃家风”名垂千古，其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 “孝肃家风”的内涵及传承

包拯，字希仁，谥号：孝肃。庐州合肥（今安徽省肥东县）人，北宋名臣。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出生于今合肥肥东县包公镇三面环山的小李蛮村。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包拯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为官26载，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孝肃家风”中的“孝肃”来源于包拯的谥号，“孝肃家风”以忠孝为本，突显廉洁，虽然以“孝、忠、廉”为突出特征的孝肃家风的最后形成，得益于后世子孙发扬光大，但包公是“孝肃家风”核心价值的构建者。包公以其言传和身教为包氏家族确立了家族文化基因，其中包公立下家训起到了价值凝聚的作用。

晚年包拯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室之中。不从我志，非吾子孙。仰拱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大意是，包家后世子孙当官，如有贪赃枉法者，开除族籍，不准再回家；死后也不准葬入包家祖坟。不遵从此训，包公就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子孙。并让儿子珙把这则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警示后人。

包拯家训仅51字却被公认为“史上最严苛家训”，形成了“孝肃家风”的独特内涵。他为包氏子孙为官画了一条底线：“不准赃滥”，突显“廉”的核心价值。包拯以其所具备的威慑力、影响力，通过立家训的方式，将自己为官的价值观“吾志”转换为家庭内部的道德规范“不准赃滥”，并借助家庭内部能够实施的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如“不得放归本家”“不得葬于大室之中”“非吾子孙”等剥夺家族身份，以此保障家训这一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他本人毕生践行“吾志”，包公一生为官26载，弹劾了许多贪官污吏，两弹宰相宋庠，六弹国丈张尧佐，七弹封疆大吏王逵。欧阳修称赞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言行一致，为自己所立的家训作了最好的示范。

包拯的家训是一个标尺，突出廉洁方面，告诫子孙，既直白又严厉。自此，“不准赃滥”便成为包氏家庭为官者的一条铁律和行为底线。包拯凭借自己清正廉洁的“身教”和晚年书面化的“言教”，为包氏家族确立了文化基因。据史料记载，包公的儿子包绶“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孙子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这些都说明，包氏子孙都一直恪守家训，居官清廉。他们都严格遵守了包拯的家训，传承了忠孝家风，形成了包氏特有的“孝、忠、廉”的“孝肃家风”。

1987年10月在包公墓落成典礼上，包公的第29代孙，当时的“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带着妻子黄秀英，专程从香港来合肥，参加包公墓的落成典礼，并拜祭先祖包公。此次合肥之行，包玉刚还将父亲包兆龙12个字的遗训刻在了包公祠一旁的浮庄里，“叶落归根，建设家乡，热爱祖国”。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包公的家风家训以忠孝为本，突显廉洁。千百年来，影响到了他的后代子孙。从包兆龙和包玉刚父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孝肃家风”的力量。

## “孝肃家风”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

“孝肃家风”虽然成之于包拯子孙几代人恪守家训，行不逾矩，但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当属包拯的言传和身教。如果说清正廉洁的个人形象反映出包拯拥有超常的自律能力的话，那么“孝肃家风”的建构则体现出包公具有高度的家庭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表现在他有意识的家庭文化创建行为上：立下家训，身体力行。包拯所构建的“孝肃家风”对今天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有什么启示呢？

思想上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有建设良好家风的自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构建家庭文化的“精神内核”。包公身体力行并在晚年立下家训就体现了家庭文化建设的自觉性。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传承和弘扬传统家庭美德，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的家庭文化成果，以家庭公约、家庭守则、家庭格言等形式，使家庭核心价值内化为家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家人的自觉行动。

行动上做优良家风的示范者。好的示范带来好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人的话告诫党员干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不只用说教教儿女做事的道理，而且还要用自己一生中所作为，做子孙最好的教科书。孝肃家风能够世代延续很重要的原因是包拯的示范效应，使得包氏子孙对家训有了更多的情感认同，进而将其发扬光大。

实践上做优良家风的培育者。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树立新时代的家庭观。即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引导家庭成员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养老育幼等方面共担责任，在自立自强、岗位建功、筑梦圆梦等方面共同发力。党员干部要筑牢家庭廉洁防线，齐家风、立家规，让人知道底线在哪里。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具体在家庭领域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传统的家庭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包拯的“孝肃家风”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为社会带来了清廉之风，是党员干部应当学习的楷模。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妇女理论教研部】

# 「孝肃家风」的当代启示

肖月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本文系2023年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成果，项目编号：QSKY2023002】